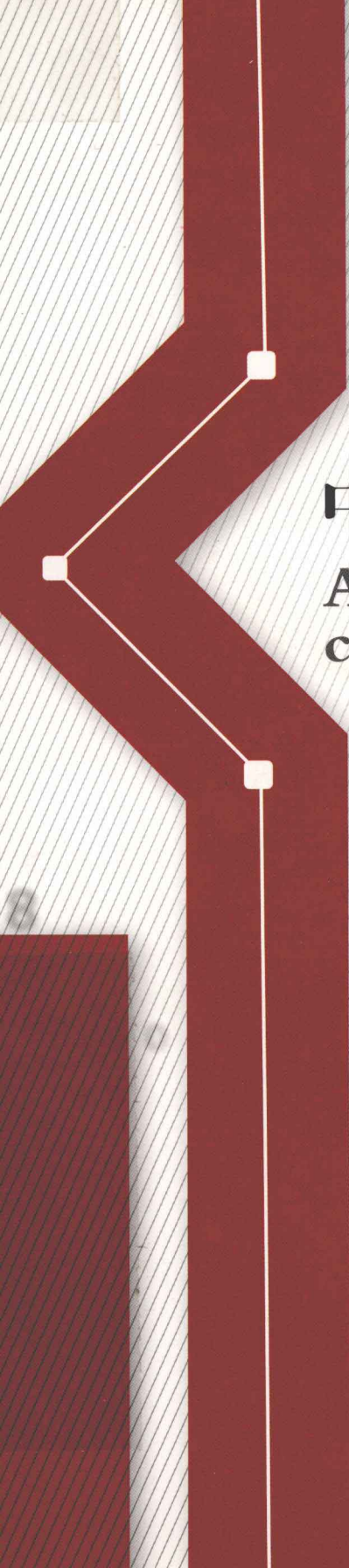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经济分析

Analysi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nomy

主编 原玉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中国当代经济分析

Analysi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nomy

主编 原玉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经济分析 / 原玉廷主编. —太原: 山西
经济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80767-568-6

I. ①中… II. ①原… III. ①中国经济—现代
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5108 号

中国当代经济分析

主 编: 原玉廷

出 版 人: 赵建廷

责任编辑: 田 玫

装帧设计: 陈 宁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发行中心)

0351-4922085(综合办)

E - mail: sxjjfx@163.com

jingjshb@sxsccb.com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568-6

定 价: 42.00 元

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

(代序)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是经济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到20世纪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学科之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这个学科面临着解释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大历史任务,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概况

(一)从古希腊的奴隶制家庭管理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最早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它直接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萌芽时期,最早是在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莱田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使用的,体现了穿着封建外衣的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渴望和理解。如果向更早的历史探索和深究的话,这个概念的源头和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分不开。在古希腊奴隶社会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 POLITICOS(希腊文)OIKONOMIA(希腊文)广泛使用,前者是指“社会”、“城市”、“国家”等多种意思,而后者则指“家庭经济管理”。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单独或混合起来使用,但总的说来都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分配和管理密切相关。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末,是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初步理解,其主要特点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流通领域,认为这就是财富的主要源泉。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的逐渐成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做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这就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次年也就是1776年,亚当·斯密正式出版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

研究》，正式宣布新兴的资产阶级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作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的经济思想支柱。1817 年代表更为激进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大卫·李嘉图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推到了顶峰。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逐渐形成，同以往所关注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逐渐分离开来，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学科。

（二）庸俗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断发展。1825 年世界上第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1847 年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现，工人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背道而驰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抛弃劳动价值论，抹杀阶级利益对立，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伴随着庸俗经济学的产生，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而空想社会主义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尖锐和无情的批判，但并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因此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论证只能限于空想的状态。

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个革命主要体现在：第一，正确解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初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把财富的增长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作为自己研究对象，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又离开了财富的生产过程，更多地注意到了财富在对立的阶级之间分配这一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则把人口和财富的比例问题当做自己研究对象。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毫无例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物上，未能注意物背后隐藏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样就使这门学科有可能沿着揭示经济现象本质并探索深层规律的正确方向前进。第二，确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这个基石是否坚固关系到大厦能否长久存在。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但却未能科学系统地说明劳动因何、为何以及如何创造

价值,从而导致他们所坚持的理论观点最后的破产。马克思提出并说明了劳动二重性的原理,指出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并转移旧产品中的价值,抽象劳动则形成商品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说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革命。第三,强调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在极力掩盖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调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全能的“神”的保护下,和平地得到每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并把它和科学性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三)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外衣,以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的姿态建立起新的庸俗学派。这些学派分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是历史学派,出现在德国,其主要特点是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革命运动。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以李斯特为先驱的历史学派。按时间顺序和观点上区别,又可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主要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以W.罗雪尔为创始人,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用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用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用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G.VON.施穆勒、瓦格纳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坚持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也被人们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另一个方向是边际效用学派,出现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其主要特点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反对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价值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三位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主观价值论的观点。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的效用程度”决定价值的大小的看法;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最不重要的欲望”决定价值大小的观点;瓦尔拉斯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或者是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奥

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在《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第一次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被日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理论又被扩大和引申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从方法论上看，这个学派形成了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与论证，主要代表人物有帕累托等。

无论是历史学派还是边际效用学派，他们基本的观点都是从唯心主义出发，否认社会存在的普遍规律，强调伦理道德、法律和主观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否定客观的价值存在，把孤立的“鲁宾逊”式的生活方式当做社会典型，鼓吹超阶级、超“社会形态”的分析，特别是边际效用学派用数学分析方法烘托所谓的“纯粹科学性”，形成所谓的“边际革命”。这不仅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学说，而且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成为以后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经济学发展的基础理论。

（四）20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急剧尖锐化，战争和危机接踵而来，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突破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诞生了。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制度以极大的冲击，随后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中国和欧洲、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变化。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列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进一步考察了生产和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新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确定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奠定了科学基础。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开拓了新的途径。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新的矛盾，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論和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論，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做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論，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又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理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分析帝国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成果。所有这些重要的理论贡献都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添加了新的篇章,而且大大丰富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内容。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有了新的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边际效用理念基础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体系。马歇尔的观点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自由竞争可以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均衡”发展。20世纪30年代琼·罗宾逊和爱德华·张伯伦又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补充了马歇尔的学说,满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分析这一时期同时存在的垄断和竞争现象的需要。马歇尔的观点在庸俗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提出了挑战,J.M.凯恩斯是最有影响的挑战者。他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认为投资和储蓄不可能自动形成均衡,主张资产阶级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这正好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因而取代马歇尔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时间长达30年之久。凯恩斯主义起了暂时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表面症状的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这个矛盾。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又出现了停滞膨胀的症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衰退、失业增多和通货膨胀从以往的交替出现变为同时并存。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了摆脱理论困境,纷纷寻求新的解释。围绕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以P.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J.罗宾逊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他们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被推崇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此时重新兴起,出现了货币主义、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和F.VON.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三大分支,他们主张限制甚至消除国家干预。还有在20世纪初就出现美国制度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从制度的表面现象剖析资本主义的病症并提出处方。此外,瑞典学派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学说以及J.A.熊彼特的“创新”学说等都是这一阶段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从微观的角度看,这些学说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均衡和完美。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学说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经济生活,目的在于倡导和组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轻周期波动的剧烈程度,以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客观地说,这些学说中的一些内容说明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运行过程,包含有科学成分,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用。

除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变化外,其他相关的学派也在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体系。

第一,经济计量学。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经济理论和数学、统计学结合起来,创立和发展了经济计量学,并由此提出了经济预测的方法。与此相联系,W.里昂惕夫提出了分析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平衡关系的投入产出法。这些学说就其内容来说,和上述有着较为强烈“辩护意识”的庸俗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广泛使用的工具。

第二,新剑桥学派。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中,大多数流派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也有一些流派断章取义地接受马克思对经济社会的分析判断,他们企图把马克思的学说和凯恩斯的学说融合起来,互相补充,因此亦被称为凯恩斯左派。这个学派主张政府经济政策的根本点应立足于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实现收入均等化,反映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力图摆脱困境的趋向。

第三,激进经济学。这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也成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这个学派提出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接近的观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第四,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由科技人员、职业经理、自由职业者、中小企业主组成的“中间阶层”人数大大增加,扩大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在欧洲,一些右翼社会党人大力主张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社会分配结构、发展私营中小企业、推行福利政策、增加养老金、提高最低工资额等改良主义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动荡。这些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随着上述各种派别的发展和演进,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对于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这种趋势甚至影响了政治经济学名称。1879年W.S.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第2版序言中,提出了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了20世纪,在西方国家中“经济学”这一名称,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也被用于应用经济学,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立的主流学派。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在阶级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在承接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不断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它获得新的发展。

它必须吸取现代各种门类科学中一切可以利用的有益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研究。分析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深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从整个体系上来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揭露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实质。同时也不排除有分析地吸取可以为己所用的实际材料、推理过程和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是清除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过程。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从而去完成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重任。

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历史沿革

从直接的历史渊源看,政治经济学是舶来品。因为它要表达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主体,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呼声和要求,而这两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出现都很晚,并且在很长时期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包括“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奢侈思想等,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与近现代资产阶级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努力发展资本生产力要求相比,还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只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才会形成对生产扩大无限追求的动力。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终于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在西方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中,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闭关锁国不能制夷。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破坏着传统的自然经济,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惊醒:必须及时掌握西方的各种学说,并以此来分析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此,西方经济学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第一,翻译并传播西方经济学著作。19世纪30~4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出版《制国之用大略》、《贸易通志》等书,以通俗的方式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1893年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写成《论生利分利之别》,说明生利是创造财富,分利是分配财富,把西方经济学的观念灌输给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王公大臣和社会商贾人士。甲午海战后,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直接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1896年严复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翻译。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学说也逐渐被提及。1899年4月李提摩太、蔡尔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相争相近之理》和《大同学》等文,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了概略的介绍,1902年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做了类似的说明。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

了切近要义的解释。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也提到过马克思的著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逐渐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期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1922年第9卷第3号和第6号上发表《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两篇文章,对《资本论》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他特别提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1920年3月,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1920年10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2期上刊载了《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之后,考茨基所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通俗读物的译本出版,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内容。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那时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有一批知识分子包括郭沫若、陈启修、侯外庐、王思华等从事秘密翻译《资本论》的工作。1938年9月,郭大力和王亚南艰苦奋斗十余年,终于翻译出齐了《资本论》的三卷本。同时,他们还翻译了当时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经济学人开始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剖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经济基础。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经济论丛》,许涤新的《官僚资本论》等著作就是成功的例子。在一些大学里,教授和学者在讲台上研究和学习政治经济学原理。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延安,《资本论》及有关书籍成为各革命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必读参考书。党的出版机构——解放社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1938年起,出版了一套“马恩丛书”。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空前的发展。

首先,党中央非常重视经典作家原著的出版工作,为全面准确地理解政治经济学原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党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陆续完成了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还编辑出版了各种选集和专题文集。

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袖人物高度重视并积极研究新中国建设时期

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理论著作,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全局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观点,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和理论专家活跃在理论杂志界和高校课堂上,通过不懈的努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党的权威理论刊物是以《学习》杂志社命名的,1958年以后改为《红旗》杂志社。在稍后一些时间里,又出现了《新建设》等许多著名的杂志社,王惠德、于光远、蒋学模等著名学者在这些杂志上撰写了大量普及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文章,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讲座》等通俗小册子,为夺取政权后党在广大群众中快速确立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各地党校以及通过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后的普通高等学校的讲台上,也聚集了郭大力、王亚南、宋涛等一大批名家,面对面地向党的干部和青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译本的出版也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共36章,按内容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第二部分讲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第三部分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四部分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前三部分合为上册出版,其特点是马克思《资本论》一、二、三卷的高度浓缩,从商品、货币开始,一直到剩余价值分配都做了相对通俗的解释。第四部分单独作为下册出版,其主要特点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简单描述和解释。客观地说这本书为新中国快速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供了便捷的模板,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和大批的理论专家都把这本书看作是一种有益的参考。与此同时,由于这本书较多地沿用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把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僵化的或者不准确的理解带给了我们。

从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具有更多政治色彩。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总路线”指导下,经济理论界围绕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多快好省与经济规律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比较多的意见是主张政治第一、经济第二,认为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要统帅经济。随着“大跃进”以后的经济调整及党内政治斗争的尖锐,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唯政治”倾向越来越严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1966年5月,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都遭受了一场浩劫,基本上处于停止发展的状态。这一时期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些所谓的“经济理论”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歪曲和篡改。例如,在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分配”、批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所谓的“思想理论界的斗争中”,出现了大量荒谬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提法和口号,主要集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以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围绕这本书出版了一些学习小册子,形成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在“两个凡是”观念的禁锢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处于僵化和停滞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开始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思想学术界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两个方面展现着自己的活力。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学习和研究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界努力进行创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观点,在基本理论的框架上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主要包括: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上,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生产力的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所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建设社

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推进祖国和平和统一大业的完成,等等。总体来说,这个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大量引进、吸收和消化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交融会通的主流趋势。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与创新,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而提出和创立的。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诸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失业、非国有经济成长、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育等等,由于这些经济现象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转轨又被赋予“社会主义”这样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经典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单纯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不可能单独适用。只有将这两种理论相互补充、相互交融,才能对特殊社会环境、特殊经济条件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吸收和消化还突出地体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侧重于依靠逻辑推理构造抽象的理论和规律,而疏于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和分析。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新一代经济学者的成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被推广使用,与规范分析方法相互交叉与迭代,焕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也较为适应中国制度变革创新的需要,因而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广为吸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基础上,90 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理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以及运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对“苏联范式”进行批评,而主要是力求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努力将这一本质上是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推向前进,使其对现实的经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理论要素上、概念范畴上乃至分析方法上的创新。这一时期这个学科讨论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力标准,所有制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道路以及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等。毫无疑问,这些讨论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显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现实社会强有力的指导意义。

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吸收和在方法论上的应用也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一时期高校通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已经大量地引入了均衡价格、机会成本、效用函数、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为这个学科贴近现实和快速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历史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984 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3 页)。这不仅是对这个《决定》的评语,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提出了必须完成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时候起 10 年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这个初稿的框架;又过了 10 年也就是进入 21 世纪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用“完善”的提法,表明了这一代人书写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骄傲和决心。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事业。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一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民族。要想站在工业生产的高峰,首先必须站在理论的高峰。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承担着对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而且也承担着为我国各门具体的经济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用无产阶级创建共产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目前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学科应该始终坚持以下基本观点: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树立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也就是大多数人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它具体化为“三个代表”的立场。“三个代表”的核心在于“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一定要始终放在这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共同富裕”上,在这个基础上恰当地看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科学地研究和统筹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关系。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指引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世界观和最基本的方法论。在当前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从实事求是,从我们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某些先验的“假定”、“逻辑”和“范式”出发。必须坚决摒弃“左”的和右的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研究任何现实问题或者把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运用于我国时,都不能忘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前提。要正确处理好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反对各种边缘化的做法

任何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语)。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就其作为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丝毫不容置疑和动摇不得的。

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已经遭到多方面的挑战,在出版界和高校的讲坛上,各种边缘化的做法屡见不鲜。这些做法有些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自身方面的,尤其是来自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原理错误的理解或牵强附会的解释;另有一些做法则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直接否定,鼓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而这些挑战和边缘化的做法,大多又是从对马克思主义

及其经济学的无知中产生的。无知产生偏见,偏见往往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边缘化做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四)坚持科学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倡导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但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样,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不仅某些具体的原理和结论可能会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就是一些带有较普遍原理性的部分,在把它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时候,也必须坚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马克思的商品和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和市场价格理论等都必须在充分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予以深化和发展,使它真正成为有效指导改革和建设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五)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通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按照习惯的理解是指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经济学的总称,从意识形态总体上来说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对立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具体内容和结论完全一无是处。事实上无论这两种对立的经济学怎样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所研究的对象说到底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因为“生产一般”、“人类社会一般”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类型,都是所有的经济学不能不涉及的客体。“西方经济学”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虽然从总的目的来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和服务的,但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和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还是有益的。以“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己任的无产阶级,要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各种文明成果,因此,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就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才能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在坚持上述基本观点的同时,政治经济学学科要积极面向现实,在解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有所作为。

第一,要科学地解决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的问题。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做一定的修改,例如用“机会均等第一,兼顾结果均等”来替代;另一些人则认为党中央从十六届四中